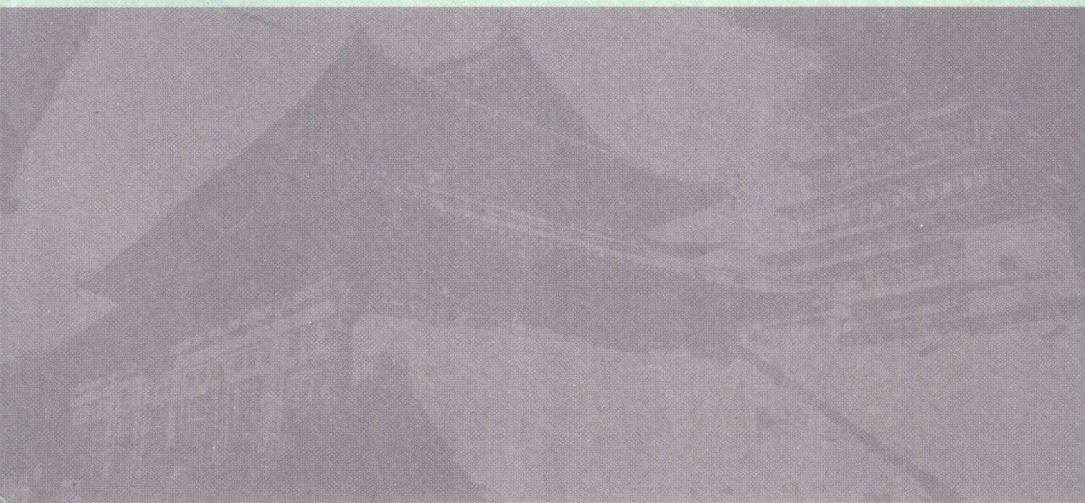


余敦华 张芝联著

中国面向世界

中法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中国面向世界

中法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余敦华 张芝联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面向世界：中法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 余敦华，张芝联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1
ISBN 978 - 7 - 108 - 02800 - 6

I. 中… II. ①余…②张… III. 中法关系 - 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研究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7125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封扉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216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22.50 元



《中国面向世界》的作者余敦华与夫人在一起



作者与余敦华夫人在香港相聚

目 录

中法文化交流

——历史的回顾

张芝联著

- 一、概述 _____ 3
- 二、吉尧姆·卢布鲁克关于中国的记述 _____ 8
- 三、17、18 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对学术
交流的贡献 _____ 10
- 四、17、18 世纪中国文化对法国的影响 _____ 23
- 五、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_____ 33
- 六、中国与法国的革命传统 _____ 36
- 七、法国文学与中国 _____ 44
- 八、汉学研究与教育事业 _____ 53

中国面向世界

——中法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余敦华著 袁树仁译 张芝联校

- 中译本前言 张芝联 _____ 65
- 余敦华夫人为中译本所写前言 _____ 69

2 中国面向世界

序言	71
第一章 革命	77
第二章 文字	99
第三章 形象	123
第四章 技术	139
第五章 个人	165
第六章 音乐	189
第七章 思想	209
第八章 狂热	237
跋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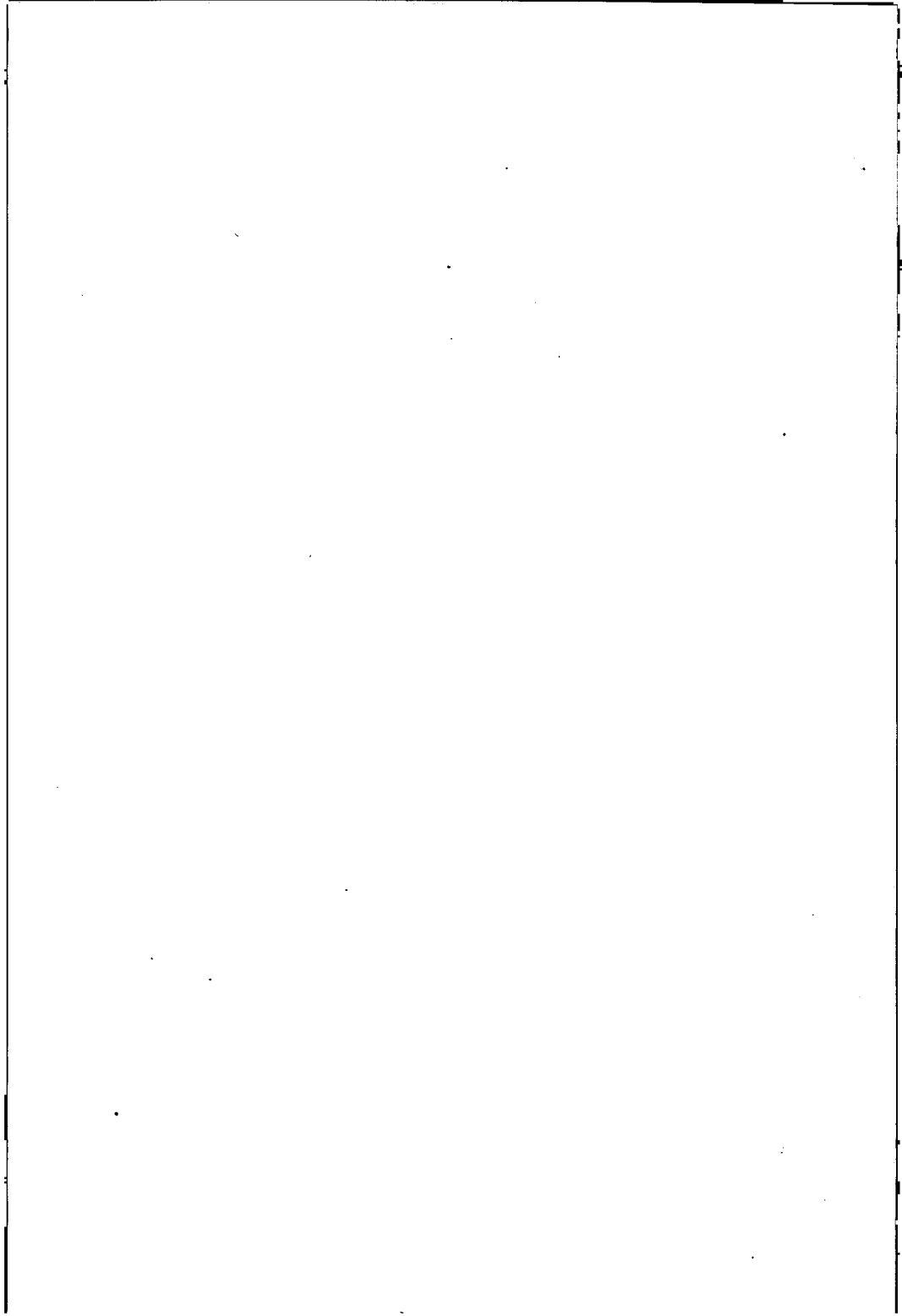
唐林给余敦华的八封复信

弗朗索瓦·余敦华—德硕姆生平年表	309
中法人民友谊的历史文化见证 乐黛云	310
张芝联教授简历	313

中法文化交流

——历史的回顾

张芝联著



一 概述

从历史上看,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历来是不平衡的,两国在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学习的热情总不是等量的。在某一时期,甲国对乙国的文化传统和成就兴趣更大,理解更深,而在另一时期则反之。这是因为研究和吸取别国文化往往出于某种社会需要,有了这种需要才会产生动力,才会排除困难和阻力去认识、钻研、介绍,进一步吸取异国文化对自己有用的部分;自然,也不排斥偶然的因素。

中国形成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远远早于法国。法国文化长期与基督教文化融为一体,到了12世纪才呈现独特的风貌,16世纪后开始对异国文化发生兴趣。当时中国文化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演变,也曾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根深叶茂;但因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太久,需要输入新鲜血液,否则有停滞窒息的危险。

就在明清之际这个时期,中法两国极少数文化人士开始发生接触。在此之前,中国还未意识到处在远西的法国的存在,而法国也只隐约地传闻远东有个“丝国”。13世纪中期,通过法王路易九世(1226—1270)派遣的使者访问蒙古的记述,以及半个世纪后马可·波罗的游记,法国才对中国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文化历史略有所知。17世纪初,有个别法国传教士由耶稣会派遣来华,亲身体验中国的古老文化和风土人情。17世纪末,清康熙帝和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互赠礼品书籍,揭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序幕。^{〔1〕}

〔1〕 参阅拙文《历史上的中法关系》,见《历史教学》1980年第三期。

宗教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传播天主教是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首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也是法国传教士的目的。中国当时奉行容忍各种宗教的政策,但天主教是新传入的异教,它在中国流传必然引起两种文化的撞击,并遭到一部分儒家士大夫的反对。传教活动最后由于天主教内部的纠纷和它对中国传统习俗的干预而被禁(1723)。虽然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化关系问题,但本文不拟过多涉及,因为它不属于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特殊问题,而是中国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互抗衡的一般问题。^{〔1〕}

然而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活动却导致几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第一,这些西方传教士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往往成为他们接近官方和士大夫的敲门砖,一部分传教士甚至充当了钦天监监正、译员和教师,从而把西方天文学、数学、医学、文字学、地理学、制图学、火器制造、艺术、音乐等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第二,为了在中国传教,必须研究和了解中国固有的文化,于是耶稣会传教士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史,写诗文,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第三,为了引起罗马教廷和西方人士对中国的兴趣,这些传教士把在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欧洲,并编辑、出版他们自己的报道和译著,向西方第一次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现行制度、礼仪习俗等。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这批西方传教士的科学活动做了如下的评价:“在文化交流史上,看来没有一件事足以和 17 世

〔1〕 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始资料,参阅《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埃蒂昂勃尔(Etiemble):《1552—1773在华耶稣会士,礼仪之争》(Les Jésuites en Chine, 1552—1773, la querelle des rites),巴黎,1966年。

纪时耶稣会传教士那样一批欧洲人的入华相比,因为他们充满了宗教热情,同时又精通那些随欧洲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兴起而发展起来的科学。……即使说他们把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带到中国只是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但由于当时东西两大文明仍互相隔绝,这种交流作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仍然是永垂不朽的。”〔1〕

法国传教士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耶稣会士编撰的三部巨帙丛书,不仅由法国传教士主编,而且在巴黎出版。这三部丛书即:

1.《海外传教士书简集》,1702至1776年陆续出版,共34卷,其中第16至26卷是关于中国的。

2.《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Du Halde)主编,1735年出版,共4卷,附有康熙时由法国传教士测绘的中国地图42幅。

3.《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1776至1814年陆续出版,共16卷。〔2〕

此外尚有法国神甫冯秉正(de Mailla)译的《通鉴纲目》,1777至1783年出版,共13卷。

这几部书在18世纪的法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法国尚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640—641页,693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2〕 这三部书的法文原文分别为: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 etc. des Chinois”.

处在封建旧制度的末期,在政界学界中正酝酿着一场大变革,专制政权和教会的反动统治成为启蒙运动的抨击对象。新发现的中国文化,不论对其解释是否正确,却向法国启蒙思想家提供了反专制、反教权的思想武器,这不是耶稣会传教士始料所及的。与此同时,中国的艺术、工艺作品源源不断传入欧洲,引起浓厚的兴趣,对法国艺术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赞同这样的结论:“在1800年以前,中国给予欧洲的比它从欧洲所获得的要多得多。”〔1〕

进入19世纪以后,这种关系逐渐颠倒过来。封建中国的衰落,殖民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中国文化在对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屡次败阵,唤起了一部分开明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意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学者编译、出版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和现状的书籍,其中关于法国的专著,有曾经到过英、法的王韬编撰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同治元年(1862)创设的同文馆开始讲授法语,学员待遇虽优,就学者却寥寥无几,三四十年内未培养出几个杰出人材。〔2〕出使法国的官员不懂法语,对所在国的历史文化知识贫乏,只有译员张德彝在出国游记中对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有所记述。19世纪末,法国文学作品开始译成汉语。翻译家林纾本人虽不谙外语,而他译的小仲马名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却引进了新思潮与新形式。

随着社会政治改革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中国知识界开始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对法

〔1〕 米·德卫兹(Devèze):《18世纪中国文明对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影响》,达观译,见《法国研究》(季刊),1985年第2期,32页。

〔2〕 参阅齐如山:《回忆录》,第二章,台北,1956年。

国的进步文化和科学,日益向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孟德斯鸠、卢梭、雨果、莫泊桑等名家的著作已有译本或介绍。这股翻译浪潮在五四运动之后更加蓬勃发展。到解放前夕,法国的文豪从莫里哀到罗曼·罗兰,无不为中国学者所熟谙,他们的作品对中国知识界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作为艺术、科学之乡的法国,也吸引了不少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到那里去创作、学习。

派遣留学生、兴办学校是了解外国文化、培养人材、沟通友谊的有效途径。中国最早一批留法学生是福建船政局在19世纪70年代派到法国去学习造船技术的。20世纪初,在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人倡导下,先后成立留法俭学会、勤工俭学会,蔡元培、毛泽东等也积极参与其事,送往法国的留学生逾二千人。这批留学生回国之后,对国内政治文化生活的影响极其深远。与此同时,中法两国热心教育人士,在上海建立了震旦大学(1903),在北京建立了中法大学(1920),在法国里昂建立了中法学院(1921)。这些高等学府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材。

在这个时期,法国的汉学研究,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作出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法兰西学院、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开设中国语言历史讲座,在巴黎大学设立中国学院。巴黎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中心。法国的文人学者,包括一些以外交家身份来华的官员,对中国文化始终保持热情,从中吸取灵感和养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京创办中法汉学研究所,为中法两国学者合作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提供有利条件。

下面分题做比较详细的介绍。

二 吉尧姆·卢布鲁克关于中国的记述

13 世纪中叶,当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之际,西欧君主在教皇号召下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运动正在节节溃败。他们企图同蒙古联络,劝说蒙古大汗信奉天主教,共同攻打占领耶路撒冷圣地的塞尔柱克突厥人。为此目的,他们曾多次遣使来到蒙古。1248 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以出生于法国北部圣马洛的方济各修士安德烈·隆如莫(André Longjumeau,或作 Longjumel)为首的使团东来。适因贵由大汗(定宗)去世,新汗未立,隆如莫只受到摄政的王后接见,带回她给法王的信。信中要求法王每年纳贡,否则将大军压境,遭到毁灭。隆如莫的使命虽然失败,但获得了关于蒙古风俗习惯的第一手资料。

1253 年,路易九世派遣另一使团,为首的是方济各修士吉尧姆·卢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约 1215—1295),出生于法属弗兰德。卢布鲁克从黑海北岸沿陆路跋涉到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受到蒙哥大汗(宪宗)的接见。从 1254 年 4 月到 8 月,他在和林住了四个多月。卢布鲁克也未能完成传教使命和联合蒙古的目的,但他写的旅行记述,却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254—1324)早半个世纪向欧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信息。^[1]

卢布鲁克第一次证实了欧洲人过去传闻的“丝国”就是中

[1] 参阅克·道森(Dawson)编:《出使蒙古记》(The Mongol Mission),原书出版于 1955 年。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以下引文均见该书。

国（他称大契丹）。他写道：

其次是大契丹，我相信，那里的居民在古代常被称为塞雷斯人（Seres）。他们那里出产最好的绸料。这种绸料依照这个民族的名称，被称为塞里克（Seric），而这个民族是由于他们的一个城市的名称而获得塞雷斯这个名称的。我从可靠方面听到，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座城市，拥有银制城墙和金制城楼。那个国家有许多省，其中若干省至今还没有臣属蒙古人。在契丹和印度之间隔着一片海。

卢布鲁克是第一个记载中国人民和文化的法国人，他在书中写道：

契丹的居民身材矮小，当他们说话时，他们通过鼻孔沉重地呼吸。同一切东方人一样，他们是小眼睛。在各项手艺中，他们都是好的工匠。他们对于草药的功效知道得很多，并且从按脉可以非常熟练地做出诊断。另一方面，他们不使用利尿剂，也不懂得关于尿的任何知识。（作者按：这里关于中医不用利尿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情况我是亲眼看到的，因为在哈刺和林有许多契丹医生。按照他们历来的风俗，父亲做什么手艺，所有的儿子们也必须做同样的手艺。

卢布鲁克书中还形容了中国的货币和文字：

契丹通常的钱是一张棉纸,长宽各有一掌左右。他们在这张纸上印有条纹,与蒙哥大汗印玺上的条纹相同。他们用一把刷子(像漆匠用的刷子那样)写字。他们在一个方块里写几个字母,这就形成一个字。

此外,卢布鲁克在游记中还对蒙古的基督教团体和教派,他们的仪式和信条,喇嘛教的信仰、仪式、服装,以及“畏吾儿”(维吾尔)、西夏、西藏的宗教、语言的特点都做了描述。他还描绘了和林宫殿建筑,以及经商的阿拉伯人地区和从事工艺的中国人地区。卢布鲁克在和林遇到了一个家住巴黎的金匠名吉尧姆·布涉(Guillaume Buchier 或作 Boucher)。他是被蒙古人从东欧俘来的,手艺高超,为蒙哥大汗制造精巧器皿。他曾为大汗制造一颗银树,根部伏着四头银狮,每头银狮有一根管子,泻出马乳,以供饮用。另有四条管道,通过树顶,分别向下倾泻四种饮料:葡萄烟、马乳、甜酒、米酒,树下有四只银碗分别接住。布涉可能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法国工匠。

卢布鲁克的著作被埋没了三百多年。幸而他返回欧洲以后,遇见英国哲学家罗吉·培根(Roger Bacon, 1214—1294)。培根不仅同他谈话,而且阅读了他的旅游报道,后来把他书中包含的地理描述吸收到自己的《主要著作》(*Opus majus*)中。

三 17、18 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对学术交流的贡献

卢布鲁克之后,有记载可查的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法国人当推